

百年 经典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李怡 / 主编

69届初中生

王安忆

正是麦收季节，南湖里一片金黄，
极远极远，天和地之间，一道隐隐
约约的树影，那是淮河，再也
望不过去了。



69届初中生

百年经典 |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王安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69届初中生 / 王安忆著；李怡主编.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6.5

(百年经典：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ISBN 978-7-5414-7702-7

I.①6… II.①王… ②李…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8762号

69届初中生

百年
经典
——
中国青少年成长文学书系



作 者 王安忆
主 编 李 怡
导 读 李 哲
项目策划 李云华 程舟行 张国龙 李晴川
责任编辑 李云华
责任校对 杨亚玲
项目编辑 李 想
美术编辑 沈秋阳
装帧设计 木 木
内文设计 刘 杨
封面绘画 羊芳涛

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
出 版 云 南 出 版 集 团 晨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发 行 电 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45mm×210mm 32 开
印 张 11
书 号 ISBN 978-7-5414-7702-7
定 价 25.00 元

退换声明：若有印刷质量问题，请及时和销售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这是与上下几届毕业生全然不同的中学生，
以前没有这样的中学生，
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中学生。

总序

生命的生长与文学的阅读

李 怡

在为中学选编的“郭沫若诗歌读本”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郭沫若的青春写作属于 20 世纪之初，在那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换时期，留学东洋、目睹世界景象的郭沫若以青春的激情和自信勾勒着他理想的新天地、理想的 new life，没有这番激情就没有现代中国文明的动力；同样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继续走到了一个新旧更替的关节点上，历史继续召唤着中国的青春代。但是，青春代是否都如郭沫若当年那么主动、自信和胸怀宽大呢？阅读今天的‘青春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敏锐，很多的聪慧，很多的感伤，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其实当年的郭沫若都有过仔细而深刻的表达，在他的诗歌、小说与自传当中，只是常常为一味‘逐潮’的人们所不知罢了；但是，平心而论，与当年的青春郭沫若相比较，今天的抒情却少了一份天狗的雄健、凤凰的昂扬与‘太平洋抒怀’的阔大与气势，新世纪的青春有理由从逼仄中冲决而出，从自恋中升腾开去，那么，回头细读郭沫若，或许就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

这里道出的其实是我对当今青少年阅读状况的基本认识。追逐青春、享受青春永远也不需要理由，但是，什么样的文字最有资格成为我们青春的伴侣却实在大有讲究。郭沫若式的青春文学并不只有灵敏和感伤，更有雄健、昂扬与阔大，这就是文学经典的意义。

生命的成长需要它的伴侣，它的朋友，它的导师，而文学经典就是我们最好的同行者。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记录的是那些曾经的“青春代”，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和今天的我们一起梦想，一起失落，一起挫折，又一起忧伤和一起求索，他们的体温温暖了我们，他们的思考启迪着我们，他们的奋斗鼓舞着我们，于是我们也有了勇气、智慧和方向。

这样表述，并不是轻蔑和排斥当下流行的文字品种——青春写作、网络文学乃至各种博客、微博等等，而是提醒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经过岁月沉淀的生命的记录才能够与我们的灵魂形成深度对话，才能够在一个更隽永的方向上释疑答惑，满足我们成长的需要。

那么，究竟怎样阅读这些文学的经典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让经典回归我们自由的感受，让文学直接与我们的生命对话。作为这一原则的反面，指的就是教科书式的阅读和机械的理论搬用。

长期以来，在僵化的教科书学习中，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解”文学作品的方式：在中小学阶段，那就是千篇一律的

“中心思想 + 段落大意 + 艺术特色”；到了大学阶段，也是各种理论概念的简单搬用，好像将这些教科书模式运用娴熟了，就“读懂”了文学作品。其实，这样一来，我们很可能恰恰远离了鲜活的文学本身，久而久之，甚至已经习以为常，再也没有办法打开我们的感受，真正进入文学的世界了。

今天，我们常常将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称作是“鉴赏”式的，以示其缺乏理性思辨的严密与知识概念的完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然而问题在于，让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理性思辨与知识概念崇拜的却是近现代以后的事情，是引入中国的种种外来理论的形态给了我们直接的启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启发过程当中，被我们轻易抛弃掉的正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弥足珍贵的基础：文学的鉴赏与解读。

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超越鉴赏”、抛弃文本解读之后，试图直接进入理性王国的大厦，然而这个由别人的概念、别人的术语所建构起来的大厦却似乎并不那么听任我们摆布。特别是当外来的学术与思想一旦在政治形势的巨变中，缩小为某一类型的思想（如苏俄）之时，其消极性的一面便更加突出了。例如，在过去，我们总是在鲁迅小说中挖掘现代革命史的形象说明，将鲁迅的文学当作革命家论述的佐证，这样一来，鲁迅就慢慢脱离了文学的鲜活，成为僵死的历史说教。

鲁迅小说必然蕴含重要的社会人生主题，这一点似乎无可怀疑。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对于所谓“社会人生主题”的理解不

可过于狭隘，也就是说，“主题”往往存在于作家情感深处对人生的基本关怀，而不一定是当时流行的某些历史观念。鲁迅小说就是这样。过去的鲁迅研究，一味在现代革命史的长河中寻找鲁迅的“革命”意义。最后，鲁迅的意义只存在于教科书里的历史主题，似乎这些主题不存在于鲁迅小说就不能证明鲁迅的价值。政治家关于中国历史性质及近现代历史的论述直接被挪作鲁迅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解都大大地曲解了鲁迅，也缩小了作为“文学”的鲁迅小说的丰富性。例如，在传统的鲁迅研究中，人们常常提及他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其实这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因为，仔细阅读鲁迅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作为鲁迅这一“社会”关注的创作，其中并没有中国现代化所必要的政治主题、经济主题与军事主题，尽管过去也有人不断将它附会于一些政治主题（如《风波》与张勋复辟，《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等等）与一些经济主题（如《伤逝》与自由婚姻的经济基础问题等等），但事实证明都与鲁迅小说的文本逻辑相去甚远。从总体上看，鲁迅并没有致力于空泛的“社会批判”，如何提高和改善中国人的生存质量才是他“社会”关怀的核心。如果说他进行了怎样的“社会批判”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也就集中于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如何以种种的形式剥夺和扼杀人的生存权利，削弱人的生存质量的。

也就是说，鲁迅社会批判的中心其实就是对摧残人权现象的批判，鲁迅所悲哀的是中国人的“非人间”生活。

这样的文学阅读也就才与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怀、人生成长联系了起来，文学经典也就成了我们亲切可感的对象。

本套丛书从生命成长的角度出发，精选近百年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时间跨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看来，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家，都无一例外地书写了生命成长的主题，而凝结于其中的种种喜怒哀乐与人生智慧，都能够对今天的青少年产生深刻的启迪。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编入每一种作品的同时，都附注了简洁的导读性文字。这些文字不是用来牵制大家的理解，相反，它们都力求在某一方向上打开我们的思维。青少年读者不妨将之与一般教科书上的讲述两相对照，细细品味其中的思想启示。



导读 69届初中生 / 1

说说《69届初中生》(代自序) / 7

第一章 / 9

一 / 9 第二章 / 38

二 / 16

一 / 38

三 / 23

二 / 48

四 / 32

三 / 56

四 / 62

五 / 71

六 / 76

第三章 / 84

一 / 85

二 / 92

三 / 103

四 / 112

五 / 119

六 / 128

第四章 / 133

一 / 133

二 / 140

三 / 151

四 / 160

第五章 / 169

一 / 169

二 / 180

三 / 189

四 / 202

第六章 / 222

五 / 213

一 / 222

二 / 230

三 / 238

四 / 245

五 / 254

六 / 263

第七章 / 272

一 / 272

二 / 281

三 / 292

四 / 300

第八章 / 308

一 / 308

二 / 313

三 / 325

四 / 333

第九章 / 338

导 读

69届初中生

王安忆的小说《69届初中生》写于1983年。在这一时期，以“文革记忆”为叙事对象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学潮流。《69届初中生》当然也有“伤痕”和“反思”的痕迹，但相比而言，它更加自然、朴实，既没有“伤痕文学”漫无边际的滥情，也避免了“反思文学”故作深刻的矫揉，它的语言近乎白描，讲述了一个女性个体在“文革”这一特殊时代中的成长故事。

理解《69届初中生》这篇小说，我们不能不把主人公雯雯的“成长史”放在更宏阔的国家历史境遇中予以审视。事实上，《69届初中生》这一题目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届”这一概念在当下“仅只标志年龄和毕业的时间”，但在那个陌生而遥远的时代里，它却成为划分人群成长轨迹最有效的界限。如王安忆在小说自序中提及的那样：“凡属‘届’内的人们，碰在一起，只要互问一声‘几几届’，然后互答一声‘几

几届’便全熟悉了。”王安忆坦承，她所关注的正是对这种丰富的历史信息的挖掘和打捞，她“升起一个妄想，要在最狭小的范围内表现最阔大的内容”。所以，当雯雯以“69届初中生”这一身份被叙述的时候，那么她作为个人经历的“成长”故事也就嵌入了国家历史变迁之中。可以说，历史已经参与了主人公雯雯的成长——“她懵懵懂懂地经过了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时候，她小学毕业，升了中学，却没有上一天课，然后下了农村，然后又抽到了县城，然后又回了上海，然后考大学，没取，又考，又不取。这是与上下几届毕业生全然不同的中学生，以前没有这样的中学生，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中学生。”

中国当代文坛并不缺乏“成长”主题，而描写“成长”与国家历史变迁的共振关系更是“文革”小说乃至整个红色经典系列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主旋律之一。但在这一批小说之中，“成长”仅仅是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一道程序，而不具有任何个体性的存在的叙事空间。只有随着“文革”结束，国家意识形态的松动，作家的个人性才有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偏移出去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忆在《69届初中生》中表现主人公雯雯充满细节的个人生活才有了空间，也正是这种充满时代感的独特的感受才成为这部小说真正值得称道的特色。在当下看来，王安忆所写的那种对生活的态度显得平淡、庸常甚至有些乏味，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感受却处于被压抑、被遮蔽甚至被无视的状态中，它的“平淡”与“庸常”反而显

得弥足珍贵。所以对于读者，甚至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这样一种对生活感受的呈现方式都充满了新奇和讶异，在历史的断层之上，它几乎具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神话意味，就像当时的读者陈丹青所说的那样：“这是三十年来写农民和青年最没有教条、最自然主义的一部作品。”陈丹青的这种评价略显夸张，但是他的确表达出80年代初的读者对这部小说最直观的感受：“不是一篇长篇小说，而是一篇写得很长的，介于回忆、自传、小说之间的东西。”对他们而言，《69届初中生》这类文本决然不是艺术虚构，相反，这恰恰是作者对自身成长史最真实、最赤裸、最不加修饰的描述与呈现。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的叙事并没有局限在《69届初中生》这一标题所指称的“初中”生活，她把叙事的起点延伸到了主人公雯雯“记事”那一年。而这也正是一个生命个体的“自我”最初形成的起点：这一年里，雯雯终于懂得了“我”，知道了“我”是谁，在这之前，她只会说：“雯雯要。”“雯雯饿。”如今，她会说：“我要。”“我饿。”“我听见。”“我看见。”“我知道。”或者是“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实际上真正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叙事者，这种“新”当然只能在那个压抑个性表述的时代的参照之中才能凸显出来。按照王安忆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忘我的时代”，那么，还有什么比对“我”本身的发生和确立更动人心弦？具体到这部小说，这个“我”使得主人公雯雯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形象，而是生成了一个独立的、充满个性化和生命意识的叙事视角。

这个崭新的叙事视角对小说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随这一视角接踵而来的，便是“童年”这一成长小说最重要主题的复活。反顾文学史就能看出，“童年”作为一个独立主题被予以表述，可以追溯至“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学发轫期。由此也可知，“童年”的发现，总是以“自我”意识凸显为前提。80年代之前，当代文学制度和小说叙事范式在压抑个性的同时，也必然形成对“童年”的遮蔽，它需要把一个身心自然发展的阶段纳入一个政治程序里。在《69届初中生》中，主人公雯雯的童年是天真、纯洁的，它不为任何国家意识形态所覆盖、所统摄，相反，通过它，作者能够生成一种对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的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不是依附于政治、道德意义，而是立足了生命存在意义本身。当然，这里所说的生命存在也并非形而上的玄理，而恰恰是彼时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因为人们能够用自身的喜怒哀乐感知历史，尽管这种感知显得紧张、忐忑、小心翼翼。

对作家王安忆而言，“自我”从国家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而对小说中的主人公雯雯来说，这是国家意识形态从“自我”中离析出去。也就是说，国家成为一个“他者”，一个与“自我”相互异质的存在物，个人的成长经历也不再与国家的历史变迁完全纠缠在一起，成为两条各自平行的线索和轨迹。这样一种分离自然不意味着国家历史对个人失去了影响和控制，相反，只有在这样一种分离中，只有一个作为生命体的个人，才能够

真正感觉到这种影响和控制。在《69届初中生》中，王安忆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雯雯充满个人性的生活，也平实质朴地袒露了自己对生活的种种感受。她所描述的生活越是具有“个人性”，便越显得不契合时代话语；对生活的感受越是真切、发乎内心，与周边的环境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越激烈。在政治上“靠边”的父母恰恰是雯雯自己的亲人，而父母被划为“右派”的娜娜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这种发乎情感而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那些用政治划分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几乎构成了两个相互抵牾的世界。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却要在这两个世界的叠加中天人交战、饱受煎熬。这种煎熬即使是雯雯离开学校，插队当知青之时也未能化解。真实的知青生活告诉她，那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理想终归只是理想，而现实却是她作为一个城市青年与“贫下中农”之间难以弥合的隔膜。

显然，雯雯的成长过程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最终表现为在生活态度上“理智与情感”之间的紧张关系。无处不在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直观感受的不同，是雯雯以及整个69届初中生群体共同的“成长的烦恼”。在这篇小说叙事之中，“情感”显然代替了“理智”而形成了小说叙事的根本构架。就雯雯这一个体人物形象而言，她的“成长史”是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也缺乏经典长篇小说那种跌宕起伏的节奏和戏剧性。甚至有人这样形容：“通篇有点像放大的连环画，因为其中每有精彩处，都因架构的不森严，与通篇叠扣得不密